

融资难与过度借贷并存 惠企施策需软硬两手抓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外贸企业融资难问题不断受到国家政策关注。今年4月25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提到,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外贸企业的融资增信支持力度。同时,一些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债务过多不断引发社会关注。国家也不断出台降杠杆、遏制企业过度借贷的政策,中办、国办早在2018年9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企业融资难与过度借贷现象为何会同时存在? 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之策是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中国贸易报》采访了一些外贸企业、行业协会和金融领域的专家,试图寻找答案与对策。

为什么有企业融资难 有企业却能过度借贷

深圳市进出口商会常务副秘书长胡婷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现在外贸企业融资比较困难。这些外贸企业申请贷款时一般拿房产抵押,由于外贸企业有一部分业务是委托其他企业代为出口,在申请信用贷款时难以完整地把这些特殊情况体现出来,于是获得的信用额度不高,能贷到的款项较少。企业借贷较多这一现象前些年即已流行于西方社会,并不断影响到世界各国。我国一部分外贸企业也存在这一问题。例如汕头市进出口商会方面向记者反馈,广东省汕头市有一部分外贸企业存在负债过高的问题。

对于企业融资难与过度借贷现象同时并存的原因,天津财经大学教授郭娜认为,融资领域不均现象本质上是信贷资源错配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与银行信贷歧视和

银企信息不对称密切相关。商业银行为了实现营利,其信贷服务主要集中于大企业、大客户以及大项目,因为住往大企业所能提供的抵押品数量以及抵押品未来产生现金流的能力更强。相比于规模相对较小的外贸企业而言,银行向规模较大的企业贷款所承担的风险更小,获取的收益更大。在信息不对称的信贷市场中,商业银行对借款企业的信用、还款能力、资金去向、投资风险以及能够获取的经济利润等信息缺乏有效的了解,从而形成了逆向选择问题,使银行难以在众多申请贷款的企业中作出恰当选择。银行逐渐形成了“重抵押轻信用”的信贷发放模式,这样就会造成资产较轻而信用程度高的优质外贸企业难以获得贷款,而有重资产但杠杆率、负债较高的企业却可以凭借充足的抵押物获得贷款。

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晓燕认为,外贸企业和微观企业融资领域不均实际是信贷配给的微观体现,即市场上一部分借款人的借款申请被接收,而另一部分借款人即使愿意支付高利率也得不到贷款。其根本原因在于外贸行业和房地产等行业本质特点不同,房地产业具有产业链条长、上下游行业多、金融关联大等特征,是国民经济系统性重要行业。因此金融机构相对而言为稳住房地产预期,不会大幅减少对房地产业的融资体量。而中小外贸企业具有规模小、资金少,管理不够规范,信用信息匮乏等特点,金融机构往往难以采信企业自行提供的质押物凭证等信用资料。通常情况下,金融机构会选择用现场考察的手段,即传统的IPC模式,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IPC模式强调银行客户经理现场调查走访、信息交叉验证及财务、税务报表等还原,来评估客户还款能力。但现实情况却是,很多中小外贸型企业财务数据不规范、缺乏第三方数据对企业真实经营情况的交叉验证。IPC模式中较为常用的数据,即所谓“三品三表”(三品指的是产品、押品、人品,三表指的是电表、水表、纳税申报表)的真实性难以确保,成本高、效率低,且风险判别容易受主观影响。综合上述因素,银行很难有持续的信心给予企业足够的信贷支持,往往会选择“惜贷”。

强化科技应用 提高监管和惠企水平

过度借贷使得企业在遇到灾害、变故时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贾鹏飞认为,借贷可以为经济输血,但借贷过多增加了杠杆,将带来经济波动,所以不能忽视企业过度借贷产生的负面影响,应努力趋利避害。

为遏止企业过度借贷问题,国家政策和法规层面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郭娜认为,首先,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根据不同的部门、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在企业层面重点强调国有企业的去杠杆,通过对国有企业等开展风险监测,完善金融机构评价体系,引导信贷资源投向效率更高的领域和行业,并结合市场化债转股、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的推进,以期达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债务风险化解的同时实现债务效率的提升。其次,为了防范房地产行业过度借贷风险,我国

应进一步完善房地产逆周期资本缓冲措施,将银行业资本监管要求与住房按揭贷款增速挂钩,以抑制房地产信贷增长过快。我国应建立系统重要性房地产企业名单。识别系统重要性实体,并对名单主体实施更为严格的杠杆、流动性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监管,以减少头部房企过度借贷风险的负面外溢效应。

贾鹏飞建议,一是加强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二是严格监控资金流向,资金应当用在正当用途,而不是去炒作投机。

针对怎样解决外贸企业融资难问题,郭娜建议,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出发,我国商业银行应该积极发展银行金融科技。商业银行应该借助金融科技的应用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优化银行信贷结构,推动银行贷款模式由“重抵押轻信用”向“重信用轻抵押”转变,从而使更多信贷资源流向优质中小企业,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商业银行更应该推动经营理念创新、加快数字技术应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要建立完善的信贷征信体系,推进行业信用建设,促进企业守信自律,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一方面,要完善行业信用数据库,逐步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系统,促进金融业信用信息整合和共享,使企业的信用信息更加透明化。另一方面,要完善信用评级行业,发展第三方权威的信用评级机构,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督管理,完善信用评级机构的评价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从而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

高晓燕则建议,一是进一步加

强对中小微外贸企业金融支持。各地方加强“政银企”对接,梳理一批业务优良又急需资金的中小微外贸企业名单,开展“清单式”管理,按照市场化原则,予以重点支持。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银行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大对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外贸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银行和保险机构深化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合作,强化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融资增信支持,增加信保保单融资规模。二是加快提升外贸企业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各地面向外贸企业,提供更多汇率避险方面的培训、咨询等公共服务。鼓励银行机构创新优化外汇产品,提升基层银行机构服务能力,积极增加汇率避险首办户,优化网上银行、线上平台汇率避险模块,提高业务办理便利性,通过内部考核激励等方式加强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汇率避险服务。

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赵琪建议,有关部门建立推动金融与公共服务领域系统互联和信息互通的机制。推进地方政府和辖区内的金融机构合作,积极探索综合电子政务数据资源对金融机构开放和共享,尤其是共享相关的税务、海关进出口货品等真实数据,弥补银行对企业的信息差,进而制定有针对性的风控策略。金融机构还要加强数字技术应用,采用平台化理念,聚焦外贸企业支付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场景的建设,提供全流程自动申请、自动审批、自主支付的融资服务,用机控代替人控,有效控制外贸企业的信用风险,大幅提升贷款审核和批准效率。

城市群的发展要优化结构相互配套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城市群的发展,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发展格局。”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近日在中国智库论坛暨2023综研院年会上说。

中美绿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林介绍,“两横三纵”是中国城市群分布的主体结构,中国真正具有国家意义的城市群有五个,沿海有三大城市群,即三大湾区城市群:一是环渤海湾城市群,涉及到辽东半岛、京津冀、山东半岛;二是长三角城市群,可把它看成是杭州湾的城市群,沿着杭州两边布局,纵深往沪宁线推,往北到江苏中地区,这是中国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群,人口总量占全国的16.8%,GDP占比接近30%;三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人口总量占全国的6%左右,但GDP占比11%左右。内陆有两大城市群:一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即武汉、长株潭和昌九(南昌、九江);二是成渝城市群,这是中国西部地区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区,目前对要素、对人才都表现出非常好的吸引力。

“未来中国经济空间一定是被城市群主导的,核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梯次扩散蔓延的发展路径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其中基础设施网络规划和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徐林表示,像高铁网络、立体交通网络等都起到很积极的领跑作用;产业链、创新链和产业创新协作是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城镇之间内在的神经网络关系,此外,最需要的还是市场配置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支撑。因为没有要素和人自由流动的话,城市群发展一定会受到各种行政或者非市场手段的干扰,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城市群内部高效分工、相互配套、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这样的格局一定是高质量发展的格局。

唐杰表示,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上海和苏州、南通、无锡的差距在缩小。上海曾经占长三角工业比重的四分之一,上海现在占长三角工业比重大概12%,下降了一半。有人说上海“空心化”,唐杰否认说,这是上海和周边地区工业水平在整体提高,上海和长三角26座城市构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工业中心,城市群内形成分工,城市之间按层次化分工。

针对城市群内部结构的优化,唐杰提出,要优化提升超大城市功能,合理降低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诸如超大城市要增强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率先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产业结构。“超大城市、一二三线城市的产业结构一定是不一样的,即在工业领域也是垂直分工体系。”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也表示,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中小城市要发展制造业,小城镇发展零部件、农产品加工业、康养休闲旅游业,城市形成分工,城市体系要合理化。同时,要建立现代化的交通体系,每个城市要成为城市群网络的一个节点。“城市群是一个经济区,它不是行政区,行政区是自上而下的,城市群是横向联合的,所以要通过城市群的合作机制,编制城市群的规划。”肖金成说。



位于天津市静海区中旺镇的天津鸚鵡乐器有限公司是一家有着71年手风琴制造生产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近年来,这家老字号企业不断与国外品牌开展合作,2018年成功收购意大利“布格里”和“07”手风琴品牌,2019年与收购的意大利“布格里”品牌合作推出“罗尼”牌手风琴。图为在天津鸚鵡乐器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车间内装配手风琴。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

抓数字产业新机遇 建北京科技新格局

■ 本报记者 王煜

作为2023中关村论坛展览(科博会)推介板块重要活动,近日,由北京市贸促会、普华永道联合主办的科技合作主题交流推介会在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举办。活动主题为“数智·重塑未来”,聚焦数字经济,围绕科技发展趋势,先进技术应用、商业模式创新等议题开展推介交流。

推介会首先呈现出政府、企业、学界深度合作,共建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的特点。

“北京市在数字经济发展上超前谋划、先行先试、高标准建设,是全球数字经济资源禀赋最充裕、发展条件最优越的城市之一。”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朱西安在致辞中指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作为全市“五子”之一,是新时代首都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对于加强“四个中心”建设、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具有关键支撑作用。据了解,北京“五子”是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2021年7月,北京印发《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

北京市贸促会副主任张秀峰表示,北京的人工智能、区块链、信创、工业互联网等核心产业规模均居全国之首,发展数字经济有着先天优势。当前,要以“两区”建设为契机,抓住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张景安表示,近年来,我国工程化落地能力持续增强,尤其是创新场景、算法和数据三驾马车实现了同步突破,也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创业潮。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将是未来竞争的重点。

普华永道中国北部市场及北京主管合伙人周星表示,各领域科技创新活动密集活跃,特别是数字化转型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渗透进程不断加快,大大缩短了创新周期,打造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变得尤为重要。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加强数据治理、保护数据安全,为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屏障,逐渐成为数字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奇安信集团副总工程师兼首席数据安全专家刘前伟表示,数据作为核心生产

要素,贯穿于数字化系统的各个环节中,如果拧不紧数据“安全阀”,不仅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甚至影响到国家安全,将造成难以承受的后果。对此,刘前伟强调,应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角度保护数据安全,通过管理和技术融合,拧紧数据“安全阀”。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下,数字技术这个生产力也需要高度重视。普华永道中国ESG技术负责合伙人李志军强调,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运营效率升级,探索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生态治理与产业经营的平衡,打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本次活动还呈现出注重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特点。

北京市顺义区作为北京高端制造业大区,当前正围绕新型工业化建设,大力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制造、柔性制造、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晓晖表示,基于中德合作契机,顺义区发挥国际先进制造企业生态聚集协同效应,

中国制造出海须做好 知产保护合规工作

2023年以来,紧张而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局势,使得海外市场的高风险性超越海外业务的复杂性成为中企国际化拓展的主要痛点。在近日举办的海外知识产权合规研讨会上,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蓝伟表示,知识产权对制造业创新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对制造业产品出口起到护航作用,因此需要全链条发力改革创新、全流程管理合规风险,让知识产权真正成为制造业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开展国际竞争的必要条件。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等机构近日发布的《百家中国制造企业出海调查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制造业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多数企业海外业务规模偏小。超过一半的调研企业海外业务营收在10亿元以下,23%的企业海外营收更是在1亿元以下。同时,海外业务营收1亿元以下的企业中,并非都是海外业务“新秀”,其中有20%的企业海外业务经营时间已经大于10年。二是海外业绩呈现分化态势。调研数据显示,有31%的企业实现50%以上的高速增长,甚至有9%的企业增速大于100%,但也有17%的企业基本持平或负增长。

在这种情形下,蓝伟表示,企业要持续加强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培训,加大业务顶层设计,从而提升自身的产品、技术竞争力,打通海外营销网络链路。

有数据显示,当前所有制造业出口产品中,机电类产品是我国出口产品的第一大品类。2022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总值为13.70万亿元,同比增长7%,占我国出口总值57.15%。此外,新能源产品出口实现超高速增长。太阳能电池、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67.8%、86.7%、119.0%。高新技术产品也在我国出口总值中占据较大比重,达到26.45%。

“高新技术时代,增加自主知识产权含量对机电企业、能源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建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辛恒民表示,这有助于保护企业技术领先地位,维护市场秩序,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价格,打击侵权行为,提升竞争优势。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也需要注意防范滥用,避免对市场正常竞争秩序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思摩尔集团IP总监丁航对欧洲及德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行了介绍,重点分析了在德国参展常见的知识产权风险及应对措施。在他看来,企业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海外知识产权规则,掌握开展知识产权国际合规风险管理的各项措施,提升在海外知识产权获权、维护、运用以及保护各环节开展合规管理的意识与能力,做好出海前风险防控,打好有准备之仗。(穆青风)